

王 萍 著

现代英国社会中的 妇女形象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王 萍 著

现代英国社会中的 的妇女形象

钱乘旦 主编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王萍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

ISBN 7-214-03876-5

I. 现... II. 王... III. 男女平等—研究 英国—现代 IV. D756.18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801 号

- 书 名 现代英国社会中的妇女形象
作 者 王 萍
责任编辑 汪振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页 2
印 数 1—3130 册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76-5/D·591
定 价 1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时候,它是从中世纪的商业行为中发展出来的,商业是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心。资本主义转变成以工业为中心的时候,它释放出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这时的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也就是我国教科书上经常说到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以动力机器和工厂组织形式的出现为标志,在社会结构方面则构造了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崇尚“自由”,主张不受约束的生产与交换,经济活动只应该服从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此,就必须有绝对“自由”的私有财产。由于这个原因,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被称为“自由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到19世纪末就开始变化了。马克思有许多判断非常准确,他说,生产的无序状态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看不见的手”造成了社会的混乱;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社会对生产与分配实行干预。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从这一判断推导出来的。以此为理论基础,就出现了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世纪末,还有很多人也看出了“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危害,他们也认为社会应该实行干预,但干预应该由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来进行,因而主张一种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就始于这个时候,但变化的过程十分

缓慢,观念方面的阻力可能与惰性有关——“自由”现在是金科玉律,不可触犯;但实际利益方面的阻力也许更实在:如果社会实行干预,私有制是否还能存在?

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加快了,原因很多,其中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对资本主义造成压力。二是在20年代末出现世界性经济总危机,这充分说明了生产的无序状态终究会导致何种后果。为避免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总崩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现在必须修正自己。人们开始形成共识,即不受约束的“自由”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而解救的方法恰恰是: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干预,包括对私有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但不是消灭)。应该看出,这是价值观念及社会建构的重大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一直不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逐渐增多,观察问题的方式也不断改进。近年之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了,出了不少成果,但这些研究仍然不够,需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真正的了解需要对一个个问题进行有深度的发掘,需要作个案研究。我们这套丛书就旨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个案问题作专题讨论,希望每个专题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反映一定的共同性。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帮助读者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至少对我们讨论的这些专题开始有真正的了解。中国的学术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愿意在漫漫长路上艰难举步。

钱乘旦

2002年12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从魔鬼走向天使	16
第一节 英国妇女的负面形象	16
第二节 工业革命与两性观的变化	25
第三节 家庭意识形态与天使形象的确立	39
第四节 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	54
小结	64
第二章 走下神坛的新女性	81
第一节 天使在人间	81
第二节 在斗争与妥协中进步	94
第三节 新女性的诞生	115
小结	131
第三章 一种新的“母亲”形象	147
第一节 获得选举权的女性	147
第二节 一战前后的机遇与挫折	162
第三节 新“母亲”的诞生	174
小结	186
第四章 走向未来的“两栖”女性	199
第一节 “双重角色”的确定	199
第二节 双重角色间的不平衡	214
第三节 在家庭与工作间寻找新的平衡	230
小结	242

目

录

结论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后记	276

绪 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大量的西方思潮被引入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对女性运动的关注,并进而也开始了对我国女性生存状况的思考。从1984年我国第一个高等学校女性学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相应的女性学研究机构。李银河、李小江、戴锦华等多位学者也在国内外的女性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对于英国的女性运动,中国人最熟悉的或许要数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这次运动以美国人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②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很快便在女性群体中得到很大的反响,并进而扩展成为一次席卷美国以及欧洲数国的大规模女性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这次的运动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绝不仅仅应归功于这次运动及其组织者本身,而是与当时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此外,更重要的是,19世纪女性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早已为这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虽然“第二次浪潮”或许显得更加有力,但若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而言,19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在这一世纪中后期的女性运动却带来了女性形象的质的飞跃,女性第一次可以和男性一样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且从此可以走出家门,走入社会,甚至名正言顺地拥有自己的事业。而在我国,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却有些不足。

因此,本书将会以具有新旧时代过渡意义的 19 世纪作为论述的起点,并进而一直延续到当代。

在对有关资料的阅读中,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伴随着英国女性在 19 世纪的觉醒,并发起了最终改变她们命运的女权运动的同时,英国女性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工业革命之前的负面形象“魔鬼”,到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天使”,以及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出现的“新女性”和 20 世纪中后期的“两栖”女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的关键不仅在于从负面形象向正面形象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从非人类形象向正常人类形象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国外的女性研究中,大量的研究结果对英国女性在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婚姻、家庭、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展示。具体到英国女性形象的研究上,关于女性形象的专著包括尼娜·奥尔巴赫的《女人与魔鬼: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话》、《我们维多利亚女权主义中的淑女形象》等,主要通过将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时代背景的结合,对女性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③。与这些著作相比,本文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的变化过程上,通过纵向的形象对比,从而使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主动斗争的历程显得更加直观。而在我国关于近代英国妇女为数不甚多的专门研究中,除了马孺的专著《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④对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关系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外,其余大多数还是集中在女性运动本身的历程及意义上^⑤,对 19 世纪英国女权运动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以及某些重要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分别进行了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些关于女权运动的研究多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对某些女权主义者个体或是某个运动过程本身进行的探讨;然而从当时整个英国大的社会背景来看,女性仍然是处于

社会的边缘地位,因此以上提到的女性形象主要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观念中的形象,而且这些形象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分别代表着怎样的意义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决定借用男性的视角,通过男性眼中女性形象在英国近代历史中的变化,探讨英国女性在这一时段中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女性自身在带来这些变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英国历史上男性和女性地位的差异决定了在工业革命之前很长一段历史中,有关女性的记录大多都只是男性眼中的女性^⑥。多拉·拉塞尔(Dora Russell)甚至提出,“我们的世界就是男性意识的结晶^⑦。”实际上,对女性的定义都是男性在对自身进行定义的基础上,将与自己相对的、从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人群确定为女人。女性的身份是依据她们与男性的关系而确定的^⑧。不光英国,在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世界的历史中女性都长期地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⑨;这一点从对西方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中都得到了体现。早在希腊文化中,著名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就传递出这样的一种信息,即在当时的战争文化中,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有价值;如果女性不从属于男性,危险与灾难必然会随之而来。虽然这其中也描绘了一些非常有能力的女神,但即使是最强大的女神也不得不接受从属于最强大的男神统治的命运^⑩。而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诗人的赫西奥德与公元前7世纪的塞蒙尼德斯更是对女性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恨和恐惧情绪^⑪。例如,在赫西奥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中,潘多拉被描绘成一个美丽、优雅、能干,但却又有着无比的邪恶与欺诈的天性的女子,她是宙斯创造出来以使男性高兴但又会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不幸礼物,从而来惩罚人类的不顺从^⑫。而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

是为女性的本性低下提供了“科学”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优越的关键，便在于男性的生殖能力：在后代的繁殖中只有男性提供了精液，而女性根本没有精液；精液是婴儿的雏形，而女性只是为之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环境；因此男性是主动而高效的，女性则是被动的，“沉默”是女性最大的美德。男性应保持对女性永久的统治^⑩。

在罗马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厌恶与恐惧可以从史书与宗教仪式中得到体现。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李维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强调旧式的道德：对于男性来说是在寡不敌众时的勇气，战士般的服从，个人英雄主义，生活方式的俭朴，庄重与严肃，忠诚以及对现有的道德秩序的遵从。与之相对的是，对于女性来说，道德与服从是她们最大的美德；任何想象中女性地位的改变都会构成对罗马道德秩序的威胁，即使这些想象中的妇女从来都没有存在过^⑪。在宗教仪式中，已婚妇女虽然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却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在祭祀等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中除了能偶尔代表自己参加之外（而男性祭祀者代表的却是某一范围内不论性别的全体公民），几乎被完全排除在外。而就在极少数她们得以被允许代表他人参加的仪式上，她们却被迫塑造一种可能对男性公民构成威胁的形象，即会给男性带来灾难，使他们虚弱无力以及被他人愚弄；这些女性代表的是偏离了正轨的男性^⑫。罗马的厌女主义者对女性的自由与能力，以及她们的性诱惑力都有着深深的恐惧。至于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基督教文化，对女性的厌恶情绪在其中达到了高潮。理安·艾斯勒认为，虽然古希腊、罗马都已经出现了厌女传统，但不管怎样，女神的继续存在至少能让痛苦中的女性感觉到希望所在，也能让人们感觉到女性存在的价值。而正是在《圣经》中，女神被彻底地删去了，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⑬。这显然是希伯

来-基督教文化共同的功劳。虽然基督教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对女性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情绪;它对于女性也不仅仅是负面的影响。其论说后来成为基督教教义的耶稣,据说是一个很有进步精神的人。有不少人认为,只是由于希腊化的且常常是对物质、人体和妇女持怀疑态度的诺斯替教的文化背景,以及犹太教的父权主义的结合,使得基督教的男人们也对妇女担忧不已,从而坚持他们的压迫地位^①。在保罗、彼得以及基督教之父杰罗姆、奥古斯丁等人的作品的影响下,世界被一分为二,女性被看成是代表肉体,代表着所有邪恶的一方;而人类决不能为肉体所役,因此必须通过控制肉体来获得人类精神世界的解放。女性惟一可能逃脱这一角色的出路就只有成为一个圣洁的处女,然而这却又是以牺牲自己的性别为代价的^②。因此,到了9世纪时,基督教已完全成为一种以男性为中心、对性持敌视态度的、具有强烈厌女倾向的宗教,它的厌女传统在西方世界中达到顶峰。这些思想逐渐被带入西方的主流思想当中,并将在价值观、各种法律与制度中体现出来。妇女的从属地位成为西方妇女所承受的最强大、且最持久的传统^③。

因此,在中世纪之前,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厌女的传统^④。女性不仅被认为在生理上不如男性完善,而且在心理上也很不成熟,难以得到教化。她们被认为会像她们的祖先夏娃,或是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一样,将把灾难与不幸带给整个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女性常常被看成是可怕的“魔鬼”般的形象。而对于这样的人群,男性必须对之严加管束,将其踩在脚下,才能保持人类世界的安宁与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英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相应的变化,上升中的士绅阶层逐渐形成了对该阶层的一种认同。为了巩固并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必须要有观念上的改变^⑤。这

种男性“荣誉”观的改变也相应地带来了女性评价的变化：过去被看成是危险、具有很强性欲的女性形象变成了被动、顺从甚至是无知的新形象。加上医学与生理学对两性差异的强调，使得男性提出了一种新的“双重领域”(separate spheres)的意识形态。“男主外，女主内”的理想由此得到进一步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得到肯定，但她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也仅限于家庭。这种正面的形象从18世纪后期起逐渐形成、发展，到了19世纪初，当资产阶级最终取代旧式贵族地主，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后达到顶峰。由此，英国开始变成了由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两极社会。资产阶级女性被冠以“天使”的名号，过去被看成是道德低下的女性此时却被认为其天生便有道德上的崇高性，因此她们将成为担负起维持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高尚道德水准的“女神”^②。帕特摩尔(Patmore)所写的长诗《房子里的天使》其流行的程度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深入人心^③。而且在19世纪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还逐渐将此观念灌输给工人阶级。这样看来，似乎进入19世纪的英国女性地位已较过去有所提高，然而事实上女性却为着这所谓的“崇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们不是真的天使，而只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天使；她们不仅没有在社会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权利，甚至连基本的财产与人身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更不必说政治权利了。当然，虽然附属于男性的地位仍在延续，但从负面向正面形象的转变毕竟也为女性的进一步解放提供了机遇。在前一种情况下，完全被鄙视的女性根本就不能指望对于她们身处其中的、且令人不快的环境产生任何影响力，更不必说做出任何有利于自己的改革；而当她们能得到一定的尊重和承认时，即使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权利，至少她们也能利用这种道德意义上的崇高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进而改变自己的境遇^④。19世纪的英国女性也的确做到

了这一点。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上提到的负面形象与正面形象都不是绝对的。正如阿曼达·维克里(Amanda Vickery)在《绅士的女儿》一书中所指出的,一直到19世纪,人们观念中的女性形象一直是在“难以置信的纯洁”与“无可救药的堕落”间徘徊^②。即使在中世纪,伟大母亲与纯洁少女形象也是存在的;而19世纪中的老处女、妓女则被斥为社会的异端,尤其是妓女更被看成是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魔鬼”。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女性形象只是在各个时期中占主要地位的形象。例如在中世纪直到近代,虽然存在忠实的妻子、顺从的女儿以及纯洁的殉教者形象,但她们都丝毫动摇不了占主导地位的厌女原则^③。同样,19世纪的老处女与妓女之所以被看成是异端,正是因为社会主流观念中的女性形象应当是纯洁如同天使,且依赖于男性而生活。当然,无论是鬼还是神,她们都是非人类,都不是和男性一样正常的人,自然也就不可能享有与之同等的权利。因此,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英国女性形象虽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不变的却是她们受压迫的地位,只不过男性所依据的理由有所变化而已^④。

那么,对于男性眼中的这些形象,女性自身又做何反应呢?她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又是否的确像过去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那样,默默无闻地接受这一切,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于现状呢?的确,年代的久远,更重要的是女性声音的缺失,令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完全准确的回答。正如《她们自己的历史》所指出的,历史上对于女性的歧视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除了只言片语的记忆之外,女性几乎已消失在历史中^⑤。所幸近年来越来越多关注女性历史的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过去已经被利用,或者尚未被人注意到的各种资料,

重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纳和总结;过去在有关男性的历史中被忽视的因素也被重新发掘出来^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女性还原到她们当时的历史中,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她们的生活、喜好与情感。多位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最黑暗的中世纪,现实中的女性也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屈从于自己的命运,而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当时的条件,尽可能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反应;她们不仅在家庭以及外界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还会利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④。当然,由于外界各种条件的不成熟,公开提出抗议的女性只能是极少数的一部分,因此难以通过主动斗争带来大的变化;加上缺乏明确的历史参照,她们也难以从一开始就找到清晰的奋斗目标。只有当足够多的女性开始对主体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之时,才有可能带来女性地位实质性的变化;也只有经过了这种长期的探索之后,她们才可能对自己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自我定位。而这正是英国女性在19世纪所做的^⑤。在这个世纪当中,越来越多的英国女性不满于自己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对自己在婚姻、教育以及工作中被剥夺正当的权利提出质疑,并进而指出决定了这些不平等的、两性在政治意义上的根本不平等;这场运动将最终在选举权运动中得到统一。虽然她们还远没有获得根本性的胜利,但她们在教育、工作以及家庭中的确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对于长期处于被压迫状态的英国女性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可以从该世纪末女性形象的再一次变化中得到体现。

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些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的新的女性形象:有的是以“独立女性”,有的以“职业女性”,还有的更是以支持选举权运动的“战斗女性”的形象出现^⑥。她们虽然重点各异,但却都属于当时社会中最突出的“新女性”形象。“新女

性”是维达(Ouida)根据女性作家萨拉·格兰德(Sarah Grand)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女性问题中的新方面》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由于当时英国19世纪末的女权运动正进行到轰轰烈烈之时,被丑化了的新女性形象的出现表明了反女权主义者对运动者加以丑化,从而达到削弱女性运动的企图^⑤。于是,“新女性”的形象充斥了当时的各类报刊、杂志,且常常以独立的、社会的反叛者、传统婚姻体制的破坏者等面目出现^⑥。然而,即使这一形象仍然是对女性的丑化,但与过去的天使形象相比,女性已经开始走下神坛,逐渐回到了人间。而且这一形象与过去的“魔鬼”与“天使”都有所不同的是,前两种形象中虽然也暗含了男性对女性潜能的担忧^⑦,但至少在外表上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自信、自大的态度;而当资产阶级男性讨论新女性形象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自信,一味地强调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而是开始流露出担心自己被取代的危机感。这表明,通过19世纪主动争取正当权利的斗争,英国的女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认为女性不属于正常人类的偏见,从而为自己进一步获取作为一名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削弱女权运动的目标也似乎并没有被实现。相反,被用以嘲笑和攻击女权主义者的这一形象却迅速被女权主义者加以利用,反其道而行,宣传女性的独立与自主,并进一步推动了女权运动走向胜利^⑧。

到了20世纪初,英国妇女在1918年和1928年分别获得了部分以及与男性完全同等的选举权之后,大规模争取法律上的平等权利的运动不再多见,更多的女权主义者开始为女性作为母亲的权利以及整个家庭的福利开始努力。一方面,一战给英国带来的伤害使更多的英国人更加重视传统家庭的意义,重视女性作为家庭中的母亲对整个英国国民素质之提高的重要意

义;而更重要的是,女性权利的获得及她们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使男性统治者越发感到了不安,于是设法尽量减少她们使用这些权利的机会。因此,这一段时期中的主流声音是对女性“母亲”形象的再次强调^⑤。然而,这种母亲的形象早已不同于维多利亚时代“天使”般的母亲了。首先,这一形象的倡导不像过去一样,完全是由男性强加给女性的。对于女性来说,强调母亲的福利不是为了将她关在家中,而是为了给其以更大的自由,使之不仅能实现一个好母亲的角色,也能在家的范围之外找到自己的天地,发挥起更大的作用,从而获得真正的自由^⑥。当然,这一形象的意义显然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因为对母亲角色的强调毕竟有可能带来忽视其他角色的效果,而且一战结束后的女性也在不少的工作领域受到男性的排挤。但与过去的种种形象相比,女性至少已经完全地回到了人间;而且女权运动者也不失时机地对这一形象加以利用,以便在事实上改善工人阶级妇女的生活状况,促进女性的利益。

回到人间的英国妇女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家庭的女性与社会的女性两者间的关系。二战结束之后女性的这两重角色终于都得到了确认,问题在于如何使两者更加平衡,因为对女性家庭角色的偏重依然约束了女性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的充分施展。时代的进步为女性提供的机会与传统观念对她们的约束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女权运动的再一次大爆发。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女性的职业身份逐渐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她们在工作中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家庭规模的减小以及男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参与都意味着她们在家庭中负担的减轻。因此,新一轮世纪之交中的英国妇女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主,她们受到的良好教育使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她们中的一小部分还登上了过去只属于男性的高位。既不放弃家